

# 伊斯特林生育理论与中国 农村人口调控

李建新

**【提要】** 本文以伊斯特林生育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农村人口生育率转变的特点,探讨了解决中国农村人口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中国农村人口问题的解决不仅要依靠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更要注重非政策因素对生育率转变的重要作用。为此,本文提供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例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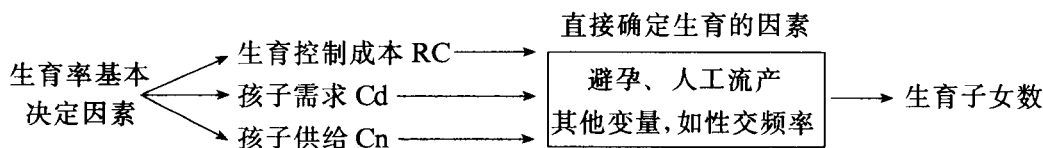
**【作者】** 李建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讲师。

## 1. 引言

90年代,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90年的14.39%降到1995年的10.55%。然而,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人口的惯性增长,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特别是农村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依然十分艰巨。农村人口的生育水平不仅地区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且也不稳定。如何抓紧抓好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依然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在这方面,国外的一些生育理论对我们是有启发的,而中国一些地区的人口综合治理的经验也是值得推广学习的。

## 2. 伊斯特林的生育理论与中国农村人口转变

美国著名的人口学家伊斯特林(R.A Easterlin)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从整个现代化进程的高度认识生育率革命的涵义,80年代在其专著《生育率革命:供给-需求分析》中,全面、多因素、多层次地考察分析了生育率的转变,并设计了一个综合的理论分析框架。



伊斯特林强调了3个影响生育行为的核心变量,即对孩子需求变量  $C_d$ , 孩子的供给变量  $C_n$  和生育控制成本变量  $RC$ 。他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每个家庭对孩子的需求数会逐步减少,而每个家庭潜在的存活孩子供给数(自然生育率情况下)会不断上升并达到最大值。当潜在的存活孩子供给数大于孩子的需求数时,家庭就产生了调节生育的动机,  $C_n - C_d$  的差值越大,控制生育的动机也就越大。而控制生育的动机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控制生育的实现,自觉控制生育的实现还会受到生育控制成本  $RC$  的影响。生育控制成本包括心理成本(如对家庭计划生育某项技术如流产的反感)和经济成本(如时间与金钱的花费)。只有生育控制成本降到每个家庭可以接受的时候,控制生育的动机才能转变成为现实。因此,生育革命事实上是由自然生育行为到自觉生育行为的转变。

在伊斯特林的生育模型中，3个影响生育行为的核心变量由基本变量包括现代化因素(如教育水平、城市化等)、文化因素(如种族、信仰等)和其它因素(如遗传因素等)来决定。在这些基本变量中，伊斯特林强调了5个主要变量。它们是(1)公共健康、卫生保健的改进；(2)普通教育的提高；(3)城市化；(4)新产品的引入(如消费品和生育调节产品)；(5)家庭计划的服务。正是这5个方面的变化，促使了人们对孩子的需求减少，同时增加了潜在子女存活数，增强了生育控制动机；而生育控制成本下降，如先进避孕节育方法的产生和便利的优质服务，最终使人们自觉有意识地调节生育成为现实，达到自己所期望的子女数(见图1)。

与西方传统的人口转变相比，中国农村生育率转变则是另一幅情景。从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农村的人口出生率已从70年代初的30%以上降至90年代初的20%以下，总和生育率从6.0降至更替水平左右。然而在农村生育率转变过程中，生育水平的下降并不是平滑的。在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期，农村生育率出现了两次较明显的波动。虽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对生育率反弹有重要的影响(曾毅等，1991)，但农村生育水平本身不稳定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农民期望的生育水平实际上要比现实的生育水平高。因此，当我们把中国农村人口生育率转变过程与伊斯特林描述的理想型转变作对比时，可以看出两者是有所不同的(见图2)。在中国农村生育率转变过程中，计划生育政策起着重要的作用。自国家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国家政策要求的平均每个育龄妇女生育的子女数(C'd)与每个家庭实际期望的子女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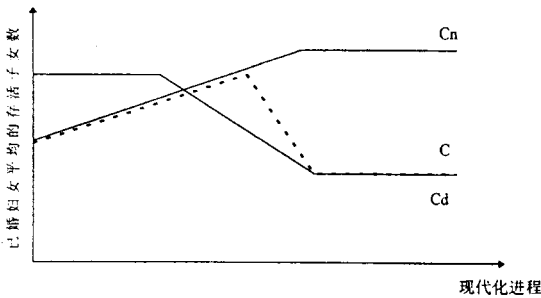


图1 伊斯特林的现代化与生育率转变的标准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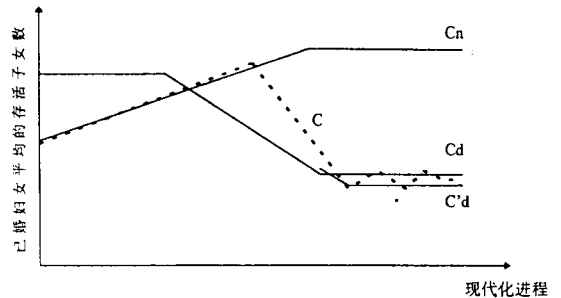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农村现代化与生育率转变

子女数(Cd)是有差距的。农村家庭的期望子女数至少在2~3个左右，而国家则要求1.5个孩子左右。因此实际生育水平值C在C'd与Cd之间波动，而且C'd与Cd的差距越大，生育水平的波动性就越大。所以当今中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难点还主要是来自于政府要求的家庭子女数与农民家庭期望子女数之间的差异。由于现实的生育水平并未达到农民的期望水平，因此，农村潜在的生育波动始终是存在的。农村人口潜在的生育率波动加上农村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控制好农村人口增长依然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伊斯特林的生育理论对解决中国农村人口问题却是富有启发性的。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思考解决这个问题。一是从国家的政策角度，如让政策要求靠近农民对孩子数的基本期望值；二是从农民家庭的角度，如降低孩子的期望数，强化生育控制的动机，向国家政策要求靠近；三是降低生育控制成本，如提供较好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面对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没有一定约束力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不现实的。无论是对社会经济发展，协调资源、环境关系，还是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效的计划生育都是十分必要的。但另一方面，让农民目前完全去满足国家对他们的要求，牺牲每个家庭的利益又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不少地区虽有严格

的计划生育条例，农民依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达到其最基本的生育意愿。本文不准备从政策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从非政策的角度来讲，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只有在坚实的社会经济发展基础上，每个家庭的生育观念、生育行为才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所以，解决中国农村人口难题，仅从某一个方面分析并解决问题已经远远不够。本文提供的下面的几个例子都是富有启发性的。如通过妇女参与社区经济活动，提高文化教育水平，改变妇女社会地位（陕西洛川、永寿）；通过农村城镇化，改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传统生育观念（苏南地区）；通过加快建设养老保险体制，解除农民只靠家庭养老的后顾之忧（山东等地）；通过改善避孕节育技术服务，消除群众接受计划生育服务的心理障碍（山东、河北等地）。从伊斯特林的生育理论来讲，所有这些努力最终都能在降低家庭对孩子的需求量上、或在降低生育控制成本上起到积极的作用，最终都从不同的方向缩小国家期望的子女数与家庭期望的孩子数的差距，直到最后消失。

### 3. 农村人口生育控制实践的不同模式

#### 3.1 陕西洛川、永寿经验：社区发展与妇女参与

中国农村正处在一个巨变时期。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经济体制变革正不断地影响着农村社区发展的方方面面，也冲击着农村社区旧的人口控制机制。研究社区发展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的中外学者都充分认识到，农村妇女参与社区发展不仅对妇女自身解放起着积极作用，而且有利于社区生育率转变（李树茁、朱楚珠，1994）。陕西省洛川县、永寿县正是在促进农村妇女广泛参与社区经济文化生活、提高自身的家庭和社会地位，从而改变高生育意愿和传统生育观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陕西省洛川县位于陕北地区南部，是陕北的贫困地区。1990年7月洛川县被作为妇女就业与生育率关系研究的实验县。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所的帮助下，洛川县这几年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努力。其一，促进和支持妇女就业，广泛参与经济发展。如让妇女参与和从事烤烟、苹果这两项投入产出比高的种植业。其二，挖掘传统产业，变妇女生产的家庭产品为市场产品。其三，举办生育观转变学校，提供计划生育服务，同时还与学习文化知识、学科学技术、扫除文盲等结合起来。

洛川县短短几年的试点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妇女生育观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根据3年的跟踪调查，妇女的生育观与社会生育观的距离在缩小（朱楚珠，1994）。洛川县社区发展与妇女参与项目的实践给予我们不少的启示。在中国农村，妇女在家庭生育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提倡和鼓励广大农村妇女积极参与社区发展，不仅可以提高妇女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提高妇女的文化教育水平和妇幼保健水平，而且最终有利于破除农村传统的生育观念，有利于促进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健康发展。

#### 3.2 山东等地的经验：建立养老保障体制

长期以来，在农村，家庭是集生产功能和赡养功能为一体的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逐步建立了一些农村社区的养老保障制度。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客观上削弱了集体经济的力量，老年农民赡养的经济来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由集体转向家庭，农村家庭的赡养功能由此得到强化。目前农村有90%以上的老人是靠子女养老或本人劳动所得供养。农村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脆弱的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保障体制是广大农民产生

“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生育观念的深厚土壤。正是这种经济基础，农民才会想尽办法避开政策多生子女，特别是要生男孩，以取得养老送终的可靠保障。所以，在有关农民生育目的的调查中，农民依然把“养儿防老”作为首选项（梁巧转等，1994；张敏，1994）。显然，要搞好农村的计划生育，建立完善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是人口综合治理的重要措施。

近几年来，国家已经开始重视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1980年，四川省率先开展了独生子女两全保险及其父母养老保险的工作。1991年国家民政部开始在山东省进行农村养老保险试点，把独生子女与父母养老“双保”扩展为农民的养老保险。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曾毅教授1993年夏在山东省试点县的调查表明：试点地区广大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积极性非常高，试点县、村、镇的投保率都在90%以上。同时还发现，越是不富裕的户，投保越积极。因为越是不富裕的农民，他们对年老之后生活着落越担心，因而参加政府组织的并能得到一定补助的社会养老保险愿望越强。更为重要的是，调查还发现，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直接淡化了“养儿防老”的传统生育观念，十分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例如，山东牟平县在实行养老保障后，半年内就有800多对独女户育龄妇女主动退掉了二胎指标（曾毅，1993）。事实上，无论是在经济较发达地区还是在落后地区，农村养老保障的建立都对农村控制人口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

目前，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覆盖面仍然很小，大量农村人口还被排斥在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之外。此外，农村老年供养标准偏低。应充分认识到，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不仅势在必行，而且还要大大加快这项事业的发展。因为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促进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贯彻执行。更重要的是，下个世纪中叶，在中等死亡率水平前提下，农村与城镇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分别达到25%和22%（曾毅，1991）。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将高于城镇。所以，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是为下世纪农村老人养老做必要的准备。

### 3.3 苏南经验：集体经济和农村城镇化

发达国家的人口生育率下降是伴随着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而发生的。人口转变经历了一个自发的、缓慢的过程。二战以后许多迟发展型国家如日本、南韩、新加坡等在经济腾飞的同时，有意识地促进了人口生育率转变，大大缩短了人口转变的历程。尽管转变的过程有所不同，但共同之处是生育率转变是在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发生的，是现代化的结果。中国由于特殊的国情、特殊的现代化道路，使中国的人口生育率转变呈现出许多与经验模式不同的特点（李建新，1994）。在中国农村许多地区，人口低生育率是靠政策约束实现的。也就是说，人口转变并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然而，苏南农村地区的人口转变是一个例外，是一个富有启示性的榜样。

苏南地区是指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三市及所辖的12个县（包括6个县级市）。自70年代起，苏南地区人口出生率从25%以上迅速下降并稳定在15%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基本稳定在10%左右，大大低于全国及江苏其它地区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苏南地区依然是以农业为主。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苏南地区的城镇人口只占总人口的28.1%。所以，苏南地区人口转变的成功实际上是苏南农村地区人口转变的成功。其成功的主要经验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集体乡镇工业的发展是生育率转变的基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普遍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活动由集体转向家庭，由此，许多农村地区的集体经济大大削弱，

有的甚至趋于瓦解。然而苏南农村地区虽然也实行承包到户，但集体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95%以上的乡镇企业由乡镇和村集体投资兴办，乡镇企业产值中的97%由集体经济创造(殷丰，1994)。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大发展就地转移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推动了就业结构的非农化。1990年拥有71.9%农村人口的苏南地区，第一产业比重仅为28.9%，而第二产业为52.2%。乡村工业化带来了农村城镇化，现代化使农民在生产、消费、生活方式上已摆脱了传统的模式。现代化还促使了价值观念的不断更新，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集体经济的发展，乡、村经济实力的增强，也促进了社会保障事业的大发展。建立农村敬老院、养老院，为农民提供养老金、公益金、教育费和医疗费，大大缩小了乡村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差别。

其二，人口、计划生育的有效管理。苏南农村地区雄厚的经济基础固然是使生育率迅速转变的重要因素，但有效的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亦是积极引导人口转变的必要前提。全国不少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农村地区，人口控制效果并不理想，而苏南地区却摸索出了一套卓有成效的计划生育工作方法。首先，实行双轨管理。改革开放以来，苏南地区成功地走了一条农村工业化的道路，乡镇企业的职工亦工亦农，他们大都白天在乡镇企业上班，早晚和农忙季节在田间劳作。由于村民的劳作方式发生了变化，原有的计划生育管理已不适应新的要求，厂村结合的双轨管理是苏南农村人口控制的一大特点。其次，加强基层队伍建设，保证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扎扎实实地开展，苏南农村在探索中建立健全了系统网络组织结构。

其三，有效地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在苏南农村地区，不仅有良好的节育避孕服务，而且还建立了妇幼保健制度，在保障妇女身心健康和促进优生优育方面提供优质服务。此外，孕前管理、宣传舆论导向、法律为主的约束机制等也都十分有利于苏南人口生育率的转变。

苏南人口转变是一个人口综合治理的典范。苏南人口最终转变为稳定的三低状态，是自发、诱导、约束三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进入90年代，苏南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稳定在10%以下，而全国和江苏省还在14%左右。在中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人口高增长的潜力和土壤还存在，为了促使人口加速转变，减缓人口压力，约束机制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要在促进巩固人口转变过程中，加速培养自觉的力量和诱导的力量。苏南地区的集体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雄厚物质基础，是人口转变的原动力和人们转变传统生育观的基础。计划生育的诱导和约束最终使低生育水平成为现实。苏南模式不论是对经济发达的乡村地区，还是对落后的乡村地区，都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中国农村人口问题的本质都是发展问题，要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解决人口难题。

#### 3.4 提高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质量的实践

伊斯特林在其论述生育率转变理论中，强调了生育控制成本RC对人口生育率转变的作用。伊斯特林认为，降低生育控制成本，才能更有效地使生育控制成为现实。

7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实施计划生育后，短短的几年，人口数量控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生育控制的低成本，如免费提供各种避孕措施，计划生育服务到达基层等。据1992年统计，全国已婚育龄夫妇节育率已达83.4%。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在不少农村地区还存在避孕措施单调、技术服务水平低、工作态度粗暴等问题，避孕措施失败等时有发生，致使群众心理压力大，影响了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积极性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农村已婚妇女的避孕方式有着明显的政策痕迹，即零孩无措施，一孩放环，二孩结扎。在目前中国妇女使用的27种避孕方法中，使用最多

的是结扎和宫内节育环，二者合计占有所有避孕方法的90%以上，而城市宫内节育环的使用率高于农村，农村结扎手术率高于城市（孙靖华，1991）。一项利用1988年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的研究指出，全国宫内节育器的5年累计失败率从60~70年代中呈直线下降；但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则呈上升趋势，特别是80年代初期，失败率上升达最高点，80年代后期又开始下降（郑真真等，1994）。该研究进一步反映出，如果消除意外妊娠原因后，续用率可提高38.59%；若消除宫内节育器脱落，续用率可提高17.0%。可见，提高避孕、节育技术服务质量对计划生育工作十分重要。要使计划生育工作上一个新台阶，就必须重视服务技术的改进和提高，计划生育工作必须从以控制“数”为中心最终转向以服务“人”为中心。

实际上，随着中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工作态度和服务质量都有了不小的改进。如农村地区积极提倡和推广“三为主”，就是明显的进步。另外，近几年来一些旨在改善基层计划生育管理，引进安全、可靠、有效的新型避孕药具，提高服务质量的试点工作在农村部分地区已经展开。其中，由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涂平教授主持负责的一项中美合作项目，即“在中国农村引进新型避孕药具的研究”取得了初步的结果。1994年7月，涂平教授在河北等实验地区的追踪调查发现，农民群众普遍反映良好。在农村实验地区，育龄妇女无论是一胎还是二胎都可以自愿地选择避孕节育措施，大大提高了群众计划生育的自觉性。计划生育干部也反映，让群众自由选择，工作好做，干群关系也大大改善。毫无疑问，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质量的提高，将会大大提高农民群众计划生育的自觉性。

#### 4. 结语

以上农村人口综合治理的实践表明，虽然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不同，人口调控的侧重点不同，但都不是单从生育政策的角度来建立控制人口机制的。应该说，伊斯特林的生育革命理论对我们是富有启发的，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人口问题本质是一个发展问题，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解决农村复杂的人口问题必须有系统观和可持续发展观。积极提倡妇女参与社区社会经济发展，由此提高妇女地位；在农村地区尽快建立起养老保险制度；发展集体经济，促进农村现代化；提高计划生育服务质量。这些努力都是解决中国农村人口问题的治本方略。

#### 参 考 文 献

- 1 曾毅等.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近年出生率回升成因的人口学分析. 人口研究, 1991, No.1
- 2 李树苗, 朱楚珠. 变革中的乡村妇女参与和人口控制新机制. 中国人口科学, 1994, No.1
- 3 梁巧转, 朱楚珠. 生育观转变的定量研究. 西安大学学报, 1994, No.3
- 4 张敏. 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社区发展与人口论文集, 西安大学出版社, 1995
- 5 朱楚珠. 想了三步, 走了两步半. 社区发展与人口论文集, 西安大学出版社, 1995
- 6 曾毅. 农村储备积累式养老保险势在必行——赴山东调查报告. 人口与计划生育, 1993, No.6
- 7 曾毅, 金沃泊. 中国未来人口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 1991, No.1
- 8 李建新. 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人口转变的特点. 社会学与社会调查, 1994, No.4-5
- 9 殷丰. 苏南社区环境对生育观念转变的影响. 社区发展与人口论文集, 西安大学出版社, 1995
- 10 孙靖华. 近20年来中国的妇女避孕变化趋势分析. 中国人口科学, 1991, No.6
- 11 郑真真. 宫内节育器在中国使用状况分析.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科研报告, 1994
- 12 李涌平. 不锈钢单环转换成铜质宫内节育器的人口学效益. 中国人口科学, 1993, No.4-5
- 13 Richard A. Easterlin and Eileen M. Crimmins: The Fertility Revolu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s Press, 1985

(本文责任编辑: 徐 莉)